

思想盛宴
文丛

盛世狂想

杨学武

著

因为经商，我才成为一个真正的杂文作者；而因为写杂文，
我才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人。

青岛出版社

心恩益晏又竺

盛世狂想

杨学武 著

 青岛出版社 | 国家一级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世狂想 / 杨学武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4.2

(思想盛宴)

ISBN 978-7-5552-0100-7

I. ①盛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杂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21005号

- 书 名 盛世狂想(思想盛宴文丛)
著 者 杨学武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(0532) 85814750(兼传真) 68068026
责任编辑 高继民 杨 慧
装帧设计 乔 峰
排 版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
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(710mm×1000mm)
印 张 10.5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0100-7
定 价 25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**4006532017 0532-68068670**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 (0532) 68068629

总 序

我建议青岛出版社出版一套杂文丛书,该社欣允。我知道,该社的一把手孟鸣飞先生素来喜欢杂文,记得去年夏天,我在青岛参加冯其庸先生《瓜饭楼从稿》编委会期间,送给孟先生拙作《牛屋杂文》,他很快就读完了。这套文丛由我主编,应当给文丛起个名字。我想到了“杂花生树”,但文友告我,上世纪80年代有套杂文丛书就用过此名,我竟全然不知,真是孤陋寡闻。后来这套丛书的策划高继民先生建议用“思想盛宴”,我觉得很好。我一向认为,杂文家首先应当是个思想家。鲁迅就是光辉的典范。他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,用他冷峻、犀利的笔,揭露、鞭挞“人吃人的”封建礼教的罪恶,并塑造了一个“精神胜利法”的典型人物阿Q,国人几乎家喻户晓,妇孺皆知。文坛前辈何满子先生曾说:“一百年后人们看鲁迅,会觉得鲁迅更伟大。”我赞同此说,四年前曾请治印大家刻了一枚闲章“鲁迅门下走狗”,并告知周海婴先生,他不禁莞尔。当然,我崇敬鲁迅,借用上海作家陈村的话说,“我还没无耻到说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。”何满子先生曾说他每年都要将《鲁迅全集》读一遍。我没有他那样的毅力,但对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至第6卷,也就是鲁迅写的主要杂文,是经常要阅读的。法乎其上,得乎其中。包括我在内的杂文家,虽然不能妄称思想家,但应当是思想者。加盟本丛书的邵燕祥先生,即以思想深刻名世。我一向不看好翻报刊刊、随便发表一点感想式的杂文,借用广州的老杂文家号称“酒鬼”的老烈先生话说,“官僚看了,说:哼,呵,挠痒痒挠得不错嘛!还可以继续挠嘛!”我更反对大批量生产杂文,再批发出去,形同一般商品;这样的杂文,还指望能与深刻二字沾边吗?杂文家应站在社会前沿,揭露假、丑、恶,彰显真、善、美,

为民主、法制、公民社会鼓与呼，并战斗到拿不动笔为止。

我曾经想将本文丛起名“青鸟文丛”。这不仅在于“青鸟”与青岛二字相近，更因为大诗人李商隐诗谓：“蓬莱此去无多路，青鸟殷勤为探看。”如果文史读者对杂文也能“殷勤为探看”，那是杂文家的福分。十多年前，杂文家牧惠（2004年病故）随我去安阳讲学。有学生提问：“怎么能将杂文普及到大学生里？”牧惠回答：“这很简单，你们经常请我来讲讲，不就行了嘛！”学生笑声一片，他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。愿将这套文丛，遥祭牧惠文兄的在天之灵。

“青鸟殷勤为探看”。愿杂文家通过自己的作品，与读者能常常殷勤探看。不亦快哉！

王春瑜

2013年7月2日于牛屋

自序

这本集子收入了相当一部分“笔墨官司”的文章，我自以为是一个“亮点”。为让读者了解官司的由来，特将“涉案”双方（有的还有第三方）的文章都收录在案，由于条件所限没能征得对方和他方的同意，在此谨致以歉意。

我在1990年出版第一本杂文集《盛世明言》时，就收入了一组类似这样的文章，曾得到了著名杂文家、出版家曾彦修（笔名严秀）先生的赞同，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：“书中有关‘写收条’一篇，收入不同意见专文，甚好，鄙意一直以为应该如此。”我一向对与人争论感兴趣，不仅认为“真理越争越明”，而且觉得杂文界理应成为争论的“特区”。鲁迅当年在上海滩发起和应战的几起大论战，尤其是“两个口号”之争，其争论之激烈，反响之广大，影响之深远，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之最。然而官方和文学界主流人士一直以来对这些争论持批评态度，认为“影响了党对文艺的领导”、“破坏了作家们的团结”，并给争论双方冠以“宗派主义”的恶名。胡风受累于此，被打成“反革命集团”，入狱二十余年，即使在平反后在这个问题上仍不被原谅，至今还受到一些人的口诛笔伐。我对文坛这种所谓“要团结，不要争论”的现象是很不赞成的，曾写专文《谁分宗派故谤伤》表达我的观点：追求文坛表面上的“一团和气”，其实就是把文坛搞成“一潭死水”。我认为，以批判为武器的杂文，当领文坛争论风气之先。我们不是高喊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么？而勇于争论正是鲁迅战斗精神的精髓。

我也许属相为鸡，且是一只“公鸡”，天性好争好鸣。而且，我“六亲不

认”，专门与熟人和朋友“对着干”。收入本集的我与鄢烈山先生和朱健国先生几组争论文章，大约可以引人注目。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且是湖北老乡，可我批评他们的文字，简直是“毫不留情”。为此，我曾在《杂文选刊》举办的笔会上，当着包括鄢、朱在内的几十位杂文朋友，解释过我的“良苦用心”：我是在“抛砖”，希望引来文友们的“玉”；我是在“投石”，希望激起杂文界的“千层浪”。

不过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，从来不认为我对别人的批评就一定正确的；而且我虽然个子小但肚量并不小，也不对别人对我的批评或反批评有什么难堪和不满。譬如我与鄢烈山先生在女人的“乳房问题”上展开的争论，我的批评文章就有不当之处。他的《乳房的功能》发表后，我读罢有感而发写了《乳房的解放》，其批评用语确实有些过火，正如章明老先生在为烈山打抱不平的文章《乳房的官司》中所说的：“可以说，这是我近些年读到的火力最猛的一篇批评文章。”这三篇文章都发表在《羊城晚报》，由于该报在全国的影响力，我们的批评与反批评文章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。好在我与烈山是老交情，他“大人大量”不计我“小人之过”。我们后来多次见面，也从未提及此事。倒也并非“乳房的官司”羞于出口，正如他在文中所说“一点羞怯都不必有”，而是我们都认为发表不同意见是太正常不过的事，因此泰然处之。

章明老先生对我的反批评，我是心服口服的。其实，我与他还是有“文字缘”的。此前他在《南方周末》发表《叫他如何参政议政》，我读了拍案叫好，以我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情写成《为章明的杂文补充一例》发表在《文汇报》上。虽然是“附和”而非批评文章，我也收进这本集子了，算是对章明老先生表达一点敬意罢。

2013年10月10日

目 录

总 序 >>> 1

自 序 >>> 3

争论也是胜利 >>> 1

真理重复一千遍也会走向反面 >>> 4

“免于恐惧”遐想 >>> 6

〔附录〕 正确对待“不同的意见” >>> 8

盛世狂想 >>> 10

郑和下西洋猜想 >>> 13

可悲的“自我原谅” >>> 17

我喜欢有毛病的领导人 >>> 20

克林顿可以“几几开”? >>> 23

奥巴马怎样“为人民服务” >>> 26

八宝山与新处女 >>> 29

〔附录〕 读《八宝山与新处女》有感 >>> 31

花圈与花架子 >>> 34

普京的“稳定观” >>> 37

“考证”病 >>> 40

“朱毛”与“毛朱” >>> 43

“宜远不宜近”与“宜粗不宜细” >>> 46

- 为章明杂文补充一例 >>> 48
- 〔附录〕 叫她如何参政议政 >>> 50
- 乳房的解放 >>> 53
- 〔附录〕 乳房的功能 >>> 55
- 乳房的官司 >>> 57
- 三聚氰胺之祸后再提乳房功能的异化 >>> 59
- “难言之隐”一说了之 >>> 61
- 把人当动物看 >>> 64
- 屈原有“屈” >>> 67
- 〔附录〕 水调歌头·读报有感 问天 >>> 69
- 文人不敌美人 >>> 70
- 〔附录〕 何必文人比美人 >>> 71
- 屈原是“世界四大文化名人”吗? >>> 73
- 雨果的“附告” >>> 75
- 答案在诗外 >>> 78
- “马在叫”与“驴在叫” >>> 80
- 〔附录〕 何来“驴在叫”? >>> 81
- 来函照登 >>> 84
- “回音壁”唤璧音回 >>> 85
- 莫以名气论英雄 >>> 88
- 〔附录〕 马三立与袁家骝 >>> 90
- 我为何“幸灾乐祸” >>> 92
- “领导带头”作用是有限的 >>> 95
- 大赦贪官 利莫大焉 >>> 98
- 死亡麻木症 >>> 101
- 中国的“自了汉” >>> 104

- 经济学家的实验室在哪里 >>> 106
- 扁鹊治病新编 >>> 108
- 漫话“敲边鼓” >>> 110
- 幸好胡风没有好“位子” >>> 112
- 毛泽东是不是杂文家 >>> 116
- 做“小杂文”也不易 >>> 119
- 〔附录〕“杂文小年”如何写 >>> 121
- 定 位 >>> 123
- 大手笔下的小人物 >>> 126
- 杂文家“忘记过去”意味着什么 >>> 128
- “四条汉子”访严秀 >>> 130
- 稍觉遗憾
- 致杨学武书 >>> 134
- 我也把朋友“得罪”一次 >>> 136
- 〔附录〕把每一个朋友“得罪”一次 >>> 138
- 我是“个体”我怕谁 >>> 143
- 我为什么要写杂文 >>> 146
- 〔附录〕亦文亦商杨学武 >>> 147
- 无情不杂文
- 杨学武接受《杂文选刊》记者访谈 >>> 150

争论也是胜利

我几十年来参加了若干次的会议，看了数不清的会议新闻，每次都要听到领导同志在会议闭幕致词中满怀豪情地高喊“同一句话”：“我们这次会议，是一个团结的大会！一个胜利的大会！”这句话让我的耳朵“听出茧子”了。也许是“茧子”越来越厚的缘故，我一直以来没把这句话“听进去”。然而近日忽然“茅塞顿开”，认识到这句话并非完全是“大话”和“空话”，而是真实地反映了颇具中国特色的“会情”。哪次会议的讨论不是“思想统一”？哪次会议的决议不是“一致通过”？这不就是与会同志“紧密团结”的胜利成果么？通过“会情”看“国情”，这不就是我国制度的优越性么？

“反观”美国等西方国家开会，当然是少有甚至没有“团结的大会”。他们好讲什么民主和自由，思想是多么不统一，观点是多么不一致。因此开起会来总是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，与会者互相作对，互不让步，吵得“脸红脖子粗”，闹得“四分五裂”乃至“不欢而散”。他们几乎没有“一致通过”的决议，有时甚至因争执不下而迫使会议中止和议题搁置。西方国家议会制害的这种“会议病”，常常受到我们某些领导同志的批评和嘲笑：“民主自由，互相顶牛。三足鼎立，互相扯皮。”认为这才是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的表现，并以此为由告诫我们千万不要照搬议会制和多党制。

然而，回顾我党的会议历史，最重要的遵义会议，却并非是一个“团结的会议”，而是一个“争论的会议”。在战争期间召开的遵义会议，名副其实地充满着“火药味”，会议不是“在充满团结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”，而是在充满激烈争论的气氛中进行的。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中央红军指挥机关（俗称最高“三人团”）在反对蒋介石军队的第五次“围剿”作战中实行单纯防御、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。党史学者余伯流在《历史转折中的毛泽东 张闻天 周恩来》中介绍：博古作“正报告”，“竭力强

调客观原因,为错误的军事领导进行辩护”;周恩来作“副报告”,不仅“作了自我批评”,而且“对李德、博古的错误指挥也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”;张闻天作“反报告”,旗帜鲜明地表示:“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”;毛泽东在长篇发言中,则是历数最高“三人团”的种种错误,尤其把李德和博古批得可谓“体无完肤”;彭德怀等军事将领们,更是拍案大怒,毫不客气地斥责李德是“瞎指挥”;即使病重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,也“挣扎着”发言,直言不讳地建议“取消李德、博古的军事指挥权,解散‘三人团’”。认为“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”;素以温和、宽容、仁慈著称的朱德,在这次会议上也禁不住发火了,伍修权在《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——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》中写道:“朱德同志历来谦虚稳重,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”,并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向中央负责人提出严重警告:“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,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。”……挨批的一方当然也不是“吃素的”,博古是最高政治首脑,李德是实际上的最高军事首脑,他们对这些激烈的批评和愤怒的指责一时接受不了,难免要进行辩护和反驳。因此,会议争论得“不可开交”,尽管没有“吵翻天”,没有“乱(烂)成一锅粥”,但可以想见,会议的气氛是多么“热烈”!

遵义会议正是因为开成了一个“争论的会议”或曰“分裂的会议”——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“分道扬镳”,才成为一个真正的“胜利的会议”。倘若不敢“犯上作乱”与中央最高权威作斗争,倘若“一团和气”不与错误路线搞“分裂”,那么遵义会议的历史就必定要改写了,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必定要改写了。

遵义会议的伟大成果和历史意义,经过几十年“经久不息”的宣传,早已“家喻户晓,妇孺皆知”,不需我在此饶舌了。不过以我对遵义会议历史文献的解读,我认为遵义会议不仅是路线斗争的胜利,也是党内民主的胜利。会议不搞“一锤定音”的大报告,而是既有“主报告”,又有“副报告”,还有“反报告”;会议不搞“一言堂”,与会者不论职位高低,可以“平起平坐”

地讨论甚至争论,下级可以批判甚至弹劾最高领导人;会议不搞“一边倒”,有赞成票,也有反对票。尤其还值得一提的是,尽管博古“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”,但他没有利用手中的最高权力压制批评,更没有“龙颜大怒”搞“拂袖退朝”那一套,也算得上是一个“明智之君”。正如余伯流所说:“28岁的博古在会议中虽然‘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’,但态度比较端正,作风比较民主,表现出了一个负总责者的风范和气度。”而博古之所以“比较民主”,却并非因为他多么“英明”,而是因为当时党的领导人还没有形成思想高度统一和权力高度集中,他还没有条件搞专制……所有这些,不正是民主的表现么?因此完全可以说,遵义会议称得上是党内民主的典范。

我们常说“团结就是胜利”,其实争论也是胜利,有时甚至是最大的胜利。不是说“真理越争越明”么?真理才是无往而不胜!因此,我们既要有“团结的大会”,又要有“争论的大会”!

(原载《杂文报》2011年10月7日)

真理重复一千遍也会走向反面

倘在迷信“天圆地方”的远古，讲“地球是圆的”，一定是神话；而在“神舟六号”升天的今天，还讲“地球是圆的”，则无疑是废话。

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一则寓言中写道：一位精神病人逃出医院，为了不让人发现他精神有问题，走在街上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：“砰，地球是圆的。”他觉得这句话是真理，而讲真理的人是不可能被当做精神病人的。可是，他最终还是被带回了精神病院。

“地球是圆的”固然是真理，但早已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。把常识性的东西拿来没完没了地重复，并自以为聪明得意，岂不是自欺欺人？自欺欺人岂不是有病？然而，讲“地球是圆的”，虽只是个别精神病人，但“讲真理”——不断重复常识性的东西，却是许多正常人的一种正常现象。

“实事求是”是真理，也是常识。可自古以来，它不是一直在被重复么？汉代史学家班固首次提出“实事求是”的观点，唐朝学者严师古将它阐释定义为：“务得事实，每求真也是。”历代文人都把“实事求是”当做为文治史的最高准则。毛泽东更是把“实事求是”发展到顶峰——提高到政治层面，上升到马列主义的高度，并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。他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中讲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，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：“‘实事’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，‘是’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，即规律性，‘求’就是我们去研究。”几十年来，“实事求是”几乎是“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”，在各级领导讲话、各种会议文件、各类新闻报道中，“实事求是”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。

“民贵君轻”是真理，也是常识。自从孟子倡导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之后，历朝大小官员都把它挂在嘴上像和尚念经一样天天念叨着；七品芝麻官唐成“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”的著名官谣，广为传唱，至今不绝于耳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“民贵君轻”的提法也与时俱进，不断创新。从“三民主义”到“为人民服务”，从“三个代表”到“执政为民”，尽管

提法不同,其实意思都是异曲同工。

类似这样的重复还有很多,似乎不用继续举例重复。既然重复真理和常识是精神病的表现,为何我们正常人还要那样“无病呻吟”呢?有人或许会说,重复是为了使我们牢记经验教训,不至于重蹈覆辙。反思历史,我们最容易犯的恰恰就是常识性的错误。譬如人不可能活到一万岁,应该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和真理吧?可几千年来我们却是那样虔诚地对皇帝高呼“万岁”;又譬如仆人为主人服务,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和真理吧?可当今那些身为“公仆”的官员,不仅不老老实实在地为作为“主人”的为人民服务,反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。于是,当我们不断地犯常识性的错误时,重复常识和真理便成为“当务之急”。

然而,历史似乎总爱开玩笑,对真理和常识不断重复的结果,往往是错误的一犯再犯。难道不是么?每当“实事求是”讲得最凶之时,个人崇拜、浮报虚夸、弄虚作假等等却是最泛滥之日。譬如“大跃进”年代,从最高领袖到基层官员,哪个不是一边高喊“实事求是”,一边鼓吹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”?毛泽东一会儿号召领导干部学习海瑞,一会儿把上“万言书”的彭德怀打成“反党分子”和“右倾机会主义头子”。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“为人民服务”讲了几十年,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却“前腐后继”、“层出不穷”。大贪官胡长清,不正是“三讲”的积极分子么?当他走向刑场“向马克思报到”之时,他前不久在主席台上大讲“为人民服务”的音容笑貌还让人们记忆犹新……

看来,谎言重复一千遍可能变为真理,而真理重复一千遍也可能变为一文不值的废话、空话和大话。尤其是把“地球是圆的”之类的常识性东西当做真理加以重复,并千方百计地把重复当做真理的“发展”和“创新”,则会走向真理的反面。

也许,当真理不需要重复的时候,真理才真正成为真理。

(原载《杂文月刊》2011年11月【上】)

“免于恐惧”遐想

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喊出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口号的改革家袁庚，还发表过另一个重要观点：他的理想，就是要创造“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环境”。然而，在当今经济改革超前、政治改革滞后的形势下，袁庚的前一句口号是鼓吹经济改革的，因而广为传播人人皆知；后一个观点是呼吁政治改革的，因而少见报道鲜为人知。

“免于恐惧”的话出自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口，他说：“所有人民都应该享有四大自由，言论自由，信仰自由，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。”袁庚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，他的最高理想当然是“实现共产主义”。那么，他把创造“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环境”当作自己的理想，是否有不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致、而与资本主义“亲密无间”之嫌？其实不然，罗斯福的“四大自由”和市场经济一样，都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。其实，就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，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有一条重要原则：要让每个人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。毛泽东也说过一句著名的“最高指示”：要创造一个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。个人充分自由和个人心情舒畅，不正是“免于恐惧”的最佳状态么？按“中国改革总设计师”邓小平的说法，既然原来被认为是“姓资”的市场经济，现在我们国家也可以搞，那么经共产党的领袖们论证过的本也属于“姓共”的“免于恐惧的自由”，我们的人民不也可以大大的享有么？

袁庚也是一个早年参军的老战士，他与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恐惧进行过生死较量。因此，他在和平年代提出“免于恐惧”，其意并非指战争或肉体上的，而是指政治或精神上的。什么叫“免于恐惧”？就是政治民主和精神自由。袁庚的这个理想，表面看来似乎也是“最高”的，可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，把要求降到最低程度：让人们“免于恐惧”地说话。袁庚当年在蛇口

高筑舆论祭坛、力主言论自由引起一场“蛇口风波”，他曾痛心疾首地说道：“40多年前，美国比较开明的罗斯福总统提出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，如果说要发表一点政治上的见解，经常都是战战兢兢的话，那么很难设想会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。”（见鞠天相著《争议与启示——袁庚在蛇口纪实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，下同）

袁庚的话是否有点危言耸听？我们在“当家作主”的今天说话还会受到恐惧？可我们在事实上不得不承认，我们从小到大似乎一直生活在“说话恐惧”之中。小时候大人讲的第一个故事是《狼外婆的故事》，使小孩对社会的第一印象就是可怕的；小孩不好好吃奶或不认真撒尿，大人就用“老虎来了”或“警察来了”相威胁；小孩调皮不听话，大人不是骂就是打……鲁迅说“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”，大人认为“辱骂恐吓绝对是教育”——“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不打不骂要变坏”。至于对小孩说话，大人的“高压政策”就更厉害了，不管小孩说话对与错，大人都可以动辄“掌嘴”；而大人说话不管是与非，小孩都不得随便“插嘴”。不仅小时候嘴巴被管得紧，而且长大了嘴门更要把得严。上学后见到老师像老鼠见了猫，哪有“知无不言”的胆量？参加工作了在领导面前要夹着尾巴做人，怎么可能“言无不尽”？总而言之，李白曰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，今人曰“说话难，难于上青天”。

中国人经历的“说话恐惧”，恐怕算得上世界之最。“反右”运动的“引蛇出洞”，使几十万人祸从口出；“文化大革命”的“文斗”“武斗”，难以计数的人遭受“灭口”之灾。彭德怀因说实话被罢官，张志新因说真话被割喉杀头……即使在解放思想、改革开放的今天，也还发生有人因“客观反映情况”而被割舌的事件。虽然伟大领袖曾明确表态说：“让人说话，天不会塌下来。”还大力号召人们向海瑞学习，说话要有“五不怕”——一不怕撤职、二不怕开除、三不怕离婚、四不怕坐牢、五不怕杀头。但说话竟然要冒如此之大如此之多的风险，未免太让人恐惧了！

袁庚在欧阳修的《纵囚论》旁留下批注：“政治论文，此为佼佼者，然而